

傅咸辞赋创作与西晋赋风

赵茂林*

(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, 甘肃 兰州 730070)

摘要 傅咸辞赋创作与西晋赋风颇有出入:就内容而言,其赋有刚健贞正的特色,体现了一种修身立诚、重于事功的儒者风尚,与西晋谦柔卑顺的士人群体性格颇为不类;在创作方法上,傅咸“触类而长”,往往就契入点申发,淡化了对物态的描写、铺陈部分,与西晋咏物赋的描写工细也有不同;其赋语言质实精当,既与当时所追求的浅显平易的语言风格有相应的一面,又在绮丽的时风中别具一格。

关键词 傅咸;辞赋;西晋

中图分类号: I207.2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6-2491(2008)04-0034-05

西晋赋家约 90 人,赋作近 400 篇^{[1](P116)},就作品数量来说远远超过汉赋的 180 篇,在辞赋史上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期。但就已有的研究来看,对一些真正有特色而历史上评价不太高的作家研究尚不够充分,对他们与西晋总体辞赋风格关系的辨识也不够深入。傅咸是西晋前期一位较有特色的赋家。其赋,包括残篇,今存 36 篇^①,是西晋作家中今存赋较多的一位。笔者不揣浅陋,尝试对傅咸辞赋创作与西晋赋风的关系作一些辨析,希望引起学者对此类作家及问题的重视。

一

傅咸一生行事颇有诤臣之风,本传评价说:“刚简有大节。风格峻整,识性明悟,疾恶如仇,推贤乐善”^{[2](P1323)},顾荣也曾说:“傅长虞为司隶,劲直忠果,劾按惊人。虽非周才,偏亮可贵也。”^{[2](P1330)}而傅咸正道直行,除因性格、家风影响外^②,亦为自觉的追求。咸宁五年定九品人才,咸直道而行,潘尼作诗劝之。潘尼《答傅咸诗序》:“司徒左长史傅长虞,会定九品。左长史宜得其才,屈为此职。此职执天下清议,宰割百国,而长虞性直而行,或有不堪。余

与之亲,作诗以规焉。”^{[3](P764)}咸忤杨骏,骏弟济作书与咸劝之。但傅咸坚持直正行事,不愿有所改变,其答杨济曰:“卫公云,酒色之杀人,此甚于作直。坐酒色死,人为不悔。逆畏以直致祸,此由心不直正,欲以苟且为明哲耳!自古以直致祸者,当自矫枉过直,或不忠允,欲以亢厉为声,故致忿耳。安有恹恹为忠益,而当见疾乎!”^{[2](P1326)}

傅咸劲直的性格以及对直道正行的自觉追求,也表现在其辞赋创作中。《晋书》本传说:“好属文论,虽绮丽不足,而言成规鉴。”^{[2](P1323)}张溥于《傅中丞集题辞》中说:“长虞短篇,时见正性,治狱《明意赋》云:‘吏砥身以存公,古有死而无柔’,一生骨鲠,风尚显白。”^{[4](P127)}傅咸赋往往包含劝谏、批判的意味,有政教功利的倾向,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情怀和追求,体现了一种修身立诚、重于事功的儒者风尚。因而,其赋就内容而言,有刚健贞正的特色。《文心雕龙·才略》:“傅玄篇章,义多规镜;长虞笔奏,世执刚中;并楨干之实才,非群华之鞞萼也。”^{[5](P701)},用来描述傅咸赋内容的特点,也是适用的。

傅咸赋就表现内容来看,主要有两类,即抒情赋

* 作者简介:赵茂林(1970—),男,甘肃张掖人,文学博士,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。主要研究《诗经》学史、魏晋南北朝文学。

① 据严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卷五十一统计,中华书局 1958 年版。下所引赋文,若非注明,皆引自此书,为避文烦,不再一一注明。

② 《晋书·傅玄传》说傅玄“性刚劲亮直,不能容人之短”、“天性峻急,不能有所容;每有奏劾,或值日暮,捧白简,整簪带,踈踊不寐,坐而待旦。于是贵游慑伏,台阁生风”。

和咏物赋。前者计有《喜雨赋》、《患雨赋》、《感凉赋》、《申怀赋》、《感别赋》、《登芒赋》、《明意赋》7篇,而《吊秦始皇赋》直接对秦始皇暴政进行抨击,也可看作抒情赋;后者有《神泉赋》等27篇,此外《小语赋》假托楚王命景差、唐勒、宋玉各赋小物,也可看作咏物赋。就抒情赋来说,《喜雨赋》、《患雨赋》、《感凉赋》虽为应时之作,但蕴含着关心民瘼之情;《感别赋》抒写离情;《登芒赋》有感于荀勖丧妻失子而作,虽有代拟性质,实际也包含作者的生命之叹;《申怀赋》、《明意赋》则是直抒胸怀。《申怀赋序》言:“余自咸宁,谬为众所许,补太子洗马,才不称职,而意常阙然。”正文则表现了补太子洗马后复杂的心理;其中有补太子洗马后的喜悦、对皇帝的感恩戴德,但也表现出担心自己才不称职而无补于时的惶恐,而“忍厚颜于寮类,甘获戾而受讥”等句则又抒发了即使获戾受讥、也要尽职尽责的意愿,颇见作者真实的心理。

《明意赋》,据《序》“侍御史傅咸奉诏治狱”,可知作于傅咸在御史中丞任上^①;

舍控款以弥载,令栖迟以淹留。吏砥身以存公,古有死而无柔。彼背正以从邪,我没世而是尤。敦肾肠以为效兮,岂文饰之足修。感恩输命,心口自灭。加我数年,竭力效节。春秋既不吾与,日月忽其不屈。周道今如砥,言人兮是由。材曲兮枉桡,朽木兮难抽。

赋中表达了竭力为国的愿望,也表现出对那种苟且柔弱、背正从邪、虚伪阿谀的人生态度的否定和反感。同时又感慨时间的流逝,但也与一般西晋文人在时间面前的怨天悯人不同,而是出于能有更多时间为国效力的考虑。结尾由己推衍,指出普遍的人生道路:应该履行正道,邪路枉行并没有什么好下场。

《吊秦始皇赋》,由其《序》“余治狱至长安”来看,亦作于御史中丞任上。作者重点分析秦之灭亡原因:一方面“政虐刑酷”,甚于桀纣;另一方面,劳民伤财,大修宫室。于是反秦风潮云涌,结果陵墓被掘、壮丽的宫殿也“未旋踵而为墟”。此赋可能有现实寓意。太熙元年(290)晋武帝临终时命杨骏为太傅、大都督,掌管朝政,辅佐惠帝。惠帝即位后,贾后弄权,于元康元年(291)与楚王玮合谋,发动政变,杀死杨骏,而政权却落在汝南王亮和元老卫瓘手中,贾后政治野心未能实现。当年六月,贾后又使楚王

玮杀汝南王亮,然后反诬楚王玮矫诏擅杀大臣,将玮处死,贾后遂执政。杨骏、汝南王亮辅政时,傅咸都曾谏言。故此赋虽为咏史,但也表现出作者的政治立场以及对现实的焦虑。

显然,抒写政治情怀是傅咸抒情赋的主要内容。这种侧重同样体现在其咏物赋中:《小语赋》为游戏之作,《相风赋》残缺,《神泉赋》、《羽扇赋》、《芸香赋》、《梧桐赋》、《舜华赋》、《班鸠赋》、《桑树赋》侧重于物态描写,其余19篇咏物赋皆能附物说理、即物抒情,表现其政治生活中的爱恶。如《纸赋》:“夫其为物,厥美可珍,廉方有则,体洁性贞”,以纸的特点象征方正贞洁的人格。《扇赋》:“蒙贵幸于斯时,无日夜而有忘。谓洪恩之可固,终靡弊于君傍。火星忽以西流,悲风起乎金商。秋日凄凄,白露为霜。体敛然以思暖,御轻裘于温房。猥弃我其若遗,去玉手而潜藏。君背故而向新,非余身之无良。哀劳徒而靡报,独怀怨于一方”,借扇秋凉被弃的遭遇,抒发无辜被弃不用哀怨之情,其中还包含着对最高统治者喜新厌旧、刻薄寡恩的谴责。

在傅咸心目中,不论何种事物都蕴含着立身行事之理,都会给人砥身事功的启发。所以他面对款冬花,看到的是一种傲然霜雪的品质(《款冬花赋》);听到蝉鸣,他意识到了时间的流逝,而时间的流逝又激发起他“唯忠谏之是与”的决心(《鸣蜩赋》);他梳头时,由梳子联想到的是要不辞劳苦、恪尽职守的责任(《栉赋》);他照镜时,镜子又引发他对“内省而自箴”的君子自我砥砺之道的体认(《镜赋》);由小孩子弄脏的酒杯,他马上意识到君子不可持身不慎(《污卮赋》);燕归故巢,更使他感慨颇多:“信进止之有序”、“随时宜以行藏,似君子之出处”、“惊鸟兽之难群,非斯人而谁与?惟里仁之为美,托君子之堂宇”、“一委身乃无余,岂改适而更赴”(《燕赋》)。

就西晋前期作家而言,并不乏有儒者风范者,但在玄学思潮的推动下,附会老庄哲学已逐渐成为小赋创作的新倾向。张华《鹪鹩赋》、夏侯湛《玄鸟赋》等皆宣扬老庄之说。傅咸赋中也有几篇颇有全身避害、抱雌守弱的味道,表现出受时风浸染的痕迹:《鸚武赋》:“谓崇峻之可固,然以慧而入笼”,表现出对智巧的摒弃;《蜉蝣赋》:“不识晦朔,无意春秋。取足一日,尚又何求?戏停淹而委

^① 陆侃如《中古文学系年》认为傅咸任御史中丞在元康元年(291),而“侍御史”为“御史中丞”之误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,第738页。

馀,何必江湖而是游!”宣扬自足其性之说;又《叩头虫赋》:“盖齿以刚克而尽,舌存以其能柔;强梁者不得其死,执雌者物莫之仇”,完全可以给老庄之说作注脚。不过,这种论调更可能是一时兴之所至,并不能说明老庄哲学已经成为其思想的组成部分。《叩头虫》阐发抱雌守弱之说,其中夹杂“犯而不校”之类的话,实际把老庄的抱雌守弱之说与儒家的怨道混为一谈,结尾更有“旨一日而三省,恒蹢躅以祗畏”之语。而《仪凤赋》更对老庄抱雌守弱、绝圣弃智之说进行了反驳,《序》曰:“《鸛鹤赋》者,广武张侯之所造也。以其形微处卑,物莫之害也。而余以为物生则有害,有害而能免,所以贵乎才智也。夫鸛鹤既无智足贵,亦祸害未免;免乎祸害者,其唯仪凤也。”鸛鹤出自《庄子·逍遥游》,仪凤则出自儒家经典《尚书·益稷》,儒家以其为德政教化的瑞应。张华以《庄子》中避世远害的鸛鹤的艺术形象为人生榜样,傅咸则崇尚“阐隆正道”、“以德见荣”(《仪凤赋》)的儒家道德与理想,正可见其思想的不同分野。

而另一方面,出于“征实”观念,不少赋家大量创作咏物赋,重于对物色或“物理”的摹写刻画,而少有情志寄托,因而饶宗颐先生评价西晋赋有“重于事形,而减于情义”^{[61](P101)}的说法。前引《文心雕龙·才略》说“傅玄篇章,义多规镜”,应就《傅子》及其章奏而言,其赋50多篇,多为咏物赋,少有寄托,亦无讽喻,只是信实程度比较高而已;其他如孙楚、成公绥等所存赋作亦不少,亦乏于兴寄。这样,西晋前期的赋家虽不乏儒者之风,但在赋作中,除傅咸赋外,却很难看到其儒者情怀。

傅咸劲直的个性,对刚正弘毅的君子之风的崇尚,和对卑劣柔弱、虚伪阿谀的人生态度的否定,都在他的赋作中有充分的展现。其个性既与西晋谦柔卑顺的士人群体性格不同,其赋作的这种刚健贞正的思想内容特色,也就在西晋赋坛显得颇为特别。

二

傅咸虽然没有专门的赋论,但在一些赋作中也提及一些创作的方法和原则,如《仪凤赋》:“赋微物以抒情”;《萤火赋》:“盖物小而喻大兮,固作者之所旌。”《叩头虫赋》:“贵不远而取譬。虽不能触类是长,且书绅以自示。”这里虽就具体的描写对象而言,实际上可以看作傅咸辞赋创作的一般方法和原则。这些说法可能受了张华的影响。张华《鸛鹤赋序》中说:“夫言有浅而可以托深,类有微而可以喻

大。”^{[7](P617)}不过就傅咸咏物赋来看,他在创作中较好地落实了自己所说的方法和原则,应该是有自己的创作体验在其中的。“赋微物以抒情”、“物小而喻大”、“贵不远而取譬”,对辞赋创作的取材以及如何表情言志作了说明,就是说,要摄取平常的事物、身边的事物,通过比况、申发等方式来表情言志。

反观傅咸赋,其取材正体现出琐细化的特征。《栲赋》、《镜赋》所咏为日常用品;《鸣蛩赋》、《青蝇赋》、《蜉蝣赋》、《萤火赋》、《叩头虫赋》皆写小虫;其既作《扇赋》,又有《羽扇赋》、《狗脊扇赋》;而《污卮赋》、《粘蝉赋》的写作则因琐事的启发,《污卮赋序》曰:“人有遗余琉璃卮者,小儿窃弄,堕之不洁,意既惜之,又有感物之污辱,乃丧其所以为宝;况君子行身,而可以有玷乎?”《粘蝉赋序》:“樱桃,其为树则多荫,其为果则先孰,故种之于厅事之前。时以盛暑,逍遥其下,有蝉鸣焉。仰而见之,聊命粘取,以弄小儿。退惟当蝉之得意于斯树,不知粘之将至,亦犹人之得意于富贵,而不虞祸之将来也。”其他咏物赋所写对象也皆不出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所说“草区禽族,庶品杂类”的范畴。

傅咸赋取材除了有琐细化的特征外,还有生活化的特征。这不仅表现在直接以日常事物入赋,而且表现在作者善于捕捉生活中的偶见、偶感为赋。《污卮赋》、《粘蝉赋》,前已述及,皆为琐事启发而作,类似者还有《舜华赋》、《班鸠赋》等;《款冬花赋》、《烛赋》、《萤火赋》等皆以偶见而命篇:《款冬花赋序》:“余曾逐禽,登于北山。于时仲冬之月也,冰凌盈谷,积雪被崖,顾见款冬,炜然始敷。”《烛赋序》:“余治狱至长安,载远多怀,与同行夜饮以忘愁。顾帷烛之自焚以致用,亦犹杀身以成仁矣。”《萤火赋序》:“余曾独处,夜不能寐,顾见萤火,意遂有感,于是执以自炤,而为之赋,……”《蜉蝣赋》、《青蝇赋》、《玉赋》等则写读书偶感:《蜉蝣赋序》:“读《诗》至《蜉蝣》,感其虽朝生暮死,而能修其翼,可以有兴,遂赋之。”《诗经·曹风》中有《蜉蝣》篇;《青蝇赋》:“幸从容以闲居,且游心于典经。览诗人之有造,刺青蝇之营营。”《小雅》中有《青蝇》篇;《玉赋序》:“《易》称乾为玉,玉之美与天合德。其在《玉藻》,仲尼论之备矣,非复鄙文所可称述。”《易·说卦》有“乾为天,为圆,为君,为父,为玉,……”之语,《礼记》有《玉藻》一篇;《燕赋》的创作是“燕归故巢”的传闻;《画像赋》则因观卞和之像而成。

“触类是长”揭示了创作的联想原则,通过联想

来达到“赋微物以抒情”、“物小而喻大”的抒情言志的目的。这也是咏物赋创作的一般原则。皇甫湜《三都赋序》中就有“触类而长之，故辞必尽丽”^{[7](P2038)}的说法；刘勰于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中谈到咏物赋的创作时说：“触兴致情，因变取会；拟诸形容，则言务纤密；象其物宜，则理贵侧附”^{[5](P135)}。不过，与同时代、甚至前代的赋家比较，傅咸简化了对物态的描写、铺陈部分，而往往直接抓住联想点抒情言志。此种创作手法以《鸣蜩赋》表现最为突出：

有嘒嘒之鸣蜩，于台府之高槐。物处阴而自惨，奚厥声之可哀？秋日凄凄兮，感时逝之若颓。曷时逝之是感兮？感年岁之我催。孰知命之不忧？咏梁木之有摧。生世忽兮如寓，求富贵于不回。且明明以在公，唯忠谏之是与；佚履道之坦坦，登高衢以自栖。

赋文一开始就写蝉鸣，但仅用了两句，旋即转入论述。先指出蝉之所以哀鸣，是因为“物处阴而自惨”，这就为下文表示要走正道及抒发履行正道的自得情绪设了伏笔。而人听到蝉声觉得可哀，实际是感受到了时序的变换，而由时序的变换中又可体悟到生命的流逝。面对生命的流逝，作者想到的是要勉力为公、正直行事。结尾两句，写作者对自己能够履行正道的自豪、满足情绪。此赋以鸣蝉为题，但并没有对蝉鸣进行细致的描摹，而是仅就蝉鸣之哀抒发，表现自己的意愿和情绪，应该是“触类是长”的典型例证。

咏蝉为咏物赋创作的一个传统题目，可谓作者众多，班昭、蔡邕、曹植、傅玄、孙楚等人都有《蝉赋》，陆云亦有《寒蝉赋》。曹植《蝉赋》颇有特色，作者主要表现蝉危惧悲苦的生活环境，寄寓了自己的身世之感。赋首对蝉高洁品德进行了铺写。当然其铺写是为了与下文蝉横遭迫害对比，来表现蝉的无辜。不过，与傅咸《鸣蝉赋》比较，还是有繁简之别。傅玄《蝉赋》则主要对蝉的生活习性、生长过程、鸣叫进行了铺叙。陆云《寒蝉赋》更浓墨重彩地对所谓蝉文、清、廉、俭、信、容等“六德”进行了描绘和歌咏。

正因为傅咸善于“触类是长”，在创作时往往就切入点抒发，不及其他，所以其赋虽描写对象各不相同，却表现出主题上惊人的趋同性。这就是说，作者内心充盈着修诚立仁的信念，所以能够触物成情，此时事物的特点、性质倒是其次。蝉鸣与“唯忠谏之是与”的信念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；能体认到萤火

虫有“进不竞于天光兮，退在晦而能明”的特性、并进而有“谅有似于贤臣兮，于疏外而尽诚”（《萤火赋》）的感慨，也只能是傅咸才能有的思路；“君子知貌之不可以不饰，则内省而自箴。既见前而虑后，则祇畏于幽深。察明明之待莹，则以此而洗心。睹日观之有瑕，则稽训于儒绅”，则是对“不将不迎，应物无方。不有心于好丑，而众形其必详。同实录于良史，随善恶而是彰”（《镜赋》）的进一步引申……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中所谈到的咏物赋的创作原则，对傅咸赋来说也就有适用、不适用之处；傅咸咏物赋确实能“触兴致情，因变取会”，侧附其理，但却不是“拟诸形容”，为言纤密。

其赋篇幅的短小，也有这方面的原因。曹植《蝉赋》不数《乱》辞，有 295 字；傅玄《蝉赋》也有 143 字；陆云《寒蝉赋》不计《序》文则有 500 多字；而傅咸《鸣蜩赋》仅 96 字。其他《纸赋》、《栲赋》、《污厄赋》、《画像赋》、《芸香赋》、《玉赋》、《梧桐赋》、《舜华赋》、《鸚武赋》、《燕赋》、《班鸠赋》、《粘蝉赋》、《青蝇赋》、《蜉蝣赋》、《萤火赋》等都是百字左右的短篇。

由于善于“触类是长”，傅咸咏物往往显得意蕴深远，此一点也得到了清人蒲铎的连连激赏：“作咏物题，须于小中见大。晋傅长虞《镜赋》云：‘不有心于好丑，而众形其必详。同实录于良史，随善恶而是彰’。六朝以下唯知‘回风却月，垂龙倚凤’，更无此有斤两句矣。”^{[8](P187)}“傅长虞《栲赋》，小中见大，寄托遥深，咏物之极则也……”^{[8](P194)}

不过，傅咸往往直接就契入点抒发，也存在感发力不足的缺陷。铺陈是辞赋创作的主要手法，也是辞赋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标志之一，刘熙载《艺概·赋概》：“赋起于情事杂沓，诗不能取，故为赋以铺陈之。斯于千态万状、层见迭出者，吐无不畅，畅无不竭。”^{[9](P86)}傅咸直接就切入点抒发，简化了对事物的铺陈描写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背离了辞赋创作的传统。这也应该是人们对傅咸赋评价不高的原因之一。铺陈为辞赋的主要表现手段，所以辞赋多使用描述性的表达方式，虽然也有不少作品流于事形，兴寄不足，但还是为读者提供了可感的形象。而作为文学作品，形象性是其感发读者的主要手段。挚虞在《文章流别论》就已指出，赋的创作则要适应“情之发，因辞以形之，礼义之旨，须事以明之”^{[10](P1905)}的要求。傅咸直接就切入点抒发，实际抽去或淡化了能够感发读者的情景，从而损伤了其赋作的情感表现力，使得其赋

作有时成了道德书或自白书。

傅咸背离辞赋创作铺陈的传统,表明其表现的重点已经不在于物事本身,而是由物事所能体认到的为人之道、为政之理。这种思维方式又与老庄哲学不无吻合之处。就“赋微物以申情”、“物小而喻大”、“触类是长”这种创作方法而言,也是与老庄思想颇有渊源的^{[1](P176)}。所以这种方法的进一步推演,就发展到了“赋乃漆园之义疏”^{[5](P675)}的地步。玄言诗赋笼罩文坛,固然是时代思潮影响的结果,但与此种创作方法畸形发展也不无关系。

显然傅咸在对“触类是长”的创作方法的践行中为我们揭示了玄言诗之类作品的发生过程,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,已远远超出了他用此种方法进行创作时的得失。

三

傅咸赋不论抒情、咏物大都直接切入正题,造语端直,言不虚发,表现出一种平实的文风。《吊秦始皇赋》直写感慨,不事雕饰,仅以对比来凸显主题;《青蝇赋》主要罗列苍蝇的罪行:“无纤芥之微用,信作害之不轻。既反白而为黑,恒怀蛆以自盈。秽美厚之鲜洁,虫嘉肴之芳馨。满堂室之薨薨,孰闺寓之得清。”全用直笔,在排比中寄寓对奸佞小人的厌恶之情;《款冬华赋》不追求对其形体色彩的渲染,而是直接彰显其内在品质:

惟兹奇卉,款冬而生。原厥物之载育,禀淳粹之至精。用能托体固阴,利此坚贞。恶朱紫之相夺,患居众之易倾。在万物之并作,故韬华而弗逞。逮皆死以枯槁,独保质而全形。华艳春晖,既丽且殊。以坚冰为膏壤,吸霜雪以自濡。非天然之真贵,曷能弥寒暑而不渝。

显然,作者似乎更喜欢使用叙述性、议论性的语言,即使是面对美丽的花朵。所以《晋书》本传说傅咸为文“绮丽不足”,实在是受时风影响的评价。不过,“绮丽不足”也恰好概括了傅咸赋平实疏阔的特点。

傅咸赋的语言除了平实,更显精当,特别在咏物赋中,作者即物即理,既能准确把握事物的特征,又能贴合所叙之理、所抒之情,可谓充分挖掘了语言的启示性功能,因而用语不多,而寄托深远。关于此,《栲赋》最具代表性:

我嘉兹栲,恶乱好理。一发不顺,实以为耻。虽日用而匪懈,不告劳而自已。苟以理而委任,期竭力而没齿。

全赋非常简短,但又非常精粹,可谓句句双关:既写出了梳子的功用、使用特性、长久使用后的结局,也表现出作者的政治抱负、努力不懈的为官态度和为责任献身的愿望。其他如《萤火赋》:“不以姿质之鄙薄兮,欲增辉乎太清。虽无补于日月兮,期自竭于陋形。”作者揣测萤火虫夜晚发光的原因,表现出竭尽所能以求有补于世的人生态度。对于此,蒲铎也颇为称道:“晋傅咸《燕赋》不多着墨,而包括无遗,尤爱其两句,云:‘凉鸟兽之难群,非斯人而谁与?’何其确切。”^{[8](P191)}

实际,傅咸也有一些赋结语细密、颇有夸饰,如《叩头虫赋》宣扬谦卑自牧之说,下笔繁复;《感别赋》写对朋友的思念,描摹自己心理也较细腻;《感凉赋》写炎热,多方表现,且有夸饰;而《小语赋》更以夸饰为能事:假托让景差、唐勒、宋玉各赋小物,一较短长。三人各逞其才,以极度夸张的手法把小物之“小”表现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当然,《小语赋》为一篇俗赋,作者写其主要出于娱乐的目的。不过,这至少表明傅咸并不乏夸饰的能力。因而,其平实精当的语言风格的形成,和作者的有意追求是分不开的。而从更深处来说,这种语言风格实际是傅咸“刚简有大节”、“劲直忠果”个性的外化,《文心雕龙·奏启》:“傅咸劲直,而按辞坚深”^{[5](P423)},就点出了傅咸个性与其作品语言的内在关系。当然,也与其“触类是长”的创作方法有一定的关系。由于采取直接就契入点申发的创作手法,傅咸赋的议论重于描写,客观上使得语言显得质实。

傅咸平实精当的语言风格既有与时风相应的一面,又有别于时风的一面。汉赋特别是大赋用词奇僻,造成了阅读的障碍,魏晋人有感于此,用字务求平易,所以《文心雕龙·通变》说:“魏晋浅而绮”^{[5](P520)},《练字》说:“自晋来用字,率从简易”^{[5](P624)}。左思于《三都赋序》中针对汉大赋夸饰失实的弊病提出了“美物者贵依其本,赞事者宜本其实”的“证实”观点,并在《三都赋》的写作中努力贯彻,此说也得到了皇甫谧的认同。而“证实”之观念在西晋前期颇见端倪。傅玄创作有大量咏物赋,就体现出浓厚的“证实”色彩。无疑,傅咸于“证实”之观念是认同的,不过与乃父把咏物赋写成注疏不同,他的咏物赋多寄托深远,他只是以平实精当的语言来体现他对“证实”的观念认同。

崇尚绮丽为西晋时期普遍风气,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说到西晋文风,以“结藻清英,流韵(下转46页)

- [9]许结.说《浑天》谈《海潮》兼论唐代科技赋的创作与成就[J].南京大学学报(哲社版),1999,(1).
- [10]万光治.汉赋通论(增订本)[M]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、华龄出版社,2004.
- [11]殷焕先、董绍克.实用音韵学[M].济南:齐鲁书社,1990.
- [12]祝尧.古赋辩体(卷十)[M].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(第1366册)[Z].商务印书馆,1986.
- [13][清]董浩,等.全唐文[M].北京:中华书局影印,1982.
- [14]章培恒、骆玉明.中国文学史[M].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

1997.

- [15]班固.前汉书[M].二十五史[Z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.
- [16]张国风.一种过渡的折衷状态——诗、赋、骈文、散文的相互消长[J].中国人民大学学报,1995(5).
- [17]马克思、恩格斯.马克思恩格斯全集(23卷)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5.

责任编辑 王晓芳

(上接 38页)

绮靡”^{[5](P674)}概括之。就西晋前期作家而言,张华、成公绥、何劭、木华、孙楚等大多数作家都刻意追求辞采,形成了一股创作主流倾向。当然,也有一些作家独立于主流之外,除了傅咸、傅玄、束皙等的作品也较为质朴。不过,傅玄的质朴主要是相对于张华、成公绥等人的绮丽而言的,实际上傅玄对绮丽文风还是持肯定态度的,其《七谟序》:“若《七依》之卓犖一致,《七辩》之缠绵精巧,《七启》之奔逸壮丽,《七释》之精密闲理,亦近代之所希也。”^{[10](P1723)}显然对丽辞靡句是赞赏的。束皙赋较为质朴,更多表现为一种“俗”,徐公持说:“束皙辞赋的‘俗化’,包括题材和语言两方面的通俗化……”^{[11](P318)}那么,语言的通俗也可以看作是题材的要求。而傅咸赋的表现对象多为一般事物,甚至是传统的,其能做到语言质朴自然在辞赋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。

不论从内容,还是从创作方法、语言表现来说,傅

咸辞赋创作与西晋赋风都有相合或不合之处,因而显得颇有特色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程章灿.魏晋南北朝赋史[M].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2001.
- [2]房玄龄.晋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4.
- [3]逯钦立.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3.
- [4]殷孟伦.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60.
- [5]范文澜.文心雕龙注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58.
- [6]王琳.魏晋辞赋史[M].哈尔滨:黑龙江教育出版社,1998.
- [7]萧统.文选[M].李善注本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.
- [8]蒲铤.复小斋诗话[M]./续修四库全书[Z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3.1716,176—197.
- [9]刘熙载.艺概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8.
- [10]严可均.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8.
- [11]徐公持.魏晋文学史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9.

责任编辑 吕斌